目　　录

我所知道的清代简州两所书院……曾兆姜（1）

以身殉学的李德彰……吴高文（4）

简阳蔗糖生产的起源及发展概况

……谢仿琴遗稿，曾明经整理（7）

石桥的义源商号……邱瑞良（13）

陈书农在合川……高烛华（26）

记简阳县地方封建政治集团——

信诚联谊会……曾家霖、杨其相口述，杨诞孚记录整理（29）

我所知道的简阳“建安社”……杨诞孚（43）

记恶霸傅鲁唯的一些罪行……晏开鑫（49）

大恶棍宋明煊罪行点滴……张道丰（53）

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惨败……方之汶（56）

简城哥老会的一场武斗……

…李肇龄、李梦余供稿，简阳县文史资料研究组综合整理（61）

简阳县川剧团的成立和发展……兰玉光（67）

简阳民间艺术之一——狮灯……傅正江（74）

更正……曾兆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所知道的清代简州两所书院

曾兆姜

为了适应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清朝政府在各地设立书院。简阳当时叫简州。曾先后设书院两所：即“凤山书院”和“通材书院”。

“凤山书院”是乾隆六年州官刘桥倡办的。校地在南宋许奕的状元府故址，即现在西街（古称状元街）城关一小所在地。因西门外有凤翅山，人们传说，凤乃“四灵”之一，故以“凤山”命名。当时书院的规模很狭小，后经州官胡德琳、宋思仁、吴映白等相继增修，逐渐扩大。光绪时，州官恒宗等又加以修缮。前后历二百多年，虽屡经变迁，但至今仍为教育的场所。

书院设山长（校长）一人，由州官聘请“品学兼优”的举人充任。另设斋长一人，主管师生生活。学生着重自治，没有专人管理。学生看哪些书籍、读哪些诗文，如何看，怎样读，书院都拟有“学约”若干条，提示学生遵照自学。平时不常讲课，如学生提出疑难问题，则详为解答。每月出诗文课题两三次，评阅后，分列等第。对试卷只批示圈点，不多修改。由于书院的宗旨是传授学生应有科考的知识，为封建统治者培养和输送人才，所以设置的主要课程是“四书”、“五经”，讲解和答问，都以理学家的观点为依据，对学生灌输的是唯心论（天命论）的忠君思想和纲常名教等封建意识。

光绪初年，张之洞任四川学院时，为了使学生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特编印《书目答问》两册，详列书名、卷数、作者姓名、出版地点，劝学生购读。又选印《辅斩语》以指示读书门径。成都原有“锦江书院”，张之洞又增设“尊经书院”一所，选调各地的秀才入院学习，院内购置经史子集数万卷，供学生阅读，使学风为之一变。时由王壬秋先生任山长，曾培养出廖季平、吴之英、宋芸子等硕学大师。

简阳也在“戊戌政变”后，仿照“尊经书院”的方式，于“凤山书院”外，另设“通材书院”。这是光绪二十五年州官马承基创办的。当时他撰了一付对联来说明他创办这所书院的宗旨：“身外无半亩，眼中有千秋，大丈夫足以豪矣；明道学圣人，希文任天下，诸君子何不效之！”他还先后拨款购书三万余册供学生学习，并延聘吴之英先生为山长。吴系尊经书院高材生，深为王壬秋先生所器重。他深钻春秋公羊学，精通三礼和群经子史，诗文朴茂，自成一家。著有《寿栎庐丛书》二十册传世。举壬午年（1882）优贡士，授灌县教谕。讲学时，以治小学、明经术、习词章启发学生，使大家认识到在过去所学“制艺”（八股文）之外，还有博大精深必须探索的学问。从此简阳学风为之大变。学生中，简城曾可传，承受吴先生公羊学，能文章。一九〇五年吴先生任四川存古学堂监督（校长）时，聘曾可传往任助教。内江余夕阳来通材书院承受吴先生书法，亦以名书法家闻于近代。吴先生在简时，曾撰书《州刺史马公丕卿创建通材书院碑记》刻石竖于院内，写作俱工，县人摹拓者颇多。今已不存。

清代设置书院，美其名曰提高文化，但究其课程的内容、要求和文体的规定来看，则完全是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以致不少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长期受到束缚，封建意识越来越深，甚至道德败坏，自甘堕落。就"凤山书院"而论，有的学生在院内聚赌抽烟（鸦片），抉玩优伶；在院外包揽词讼，横行乡里。一八九〇年，俞为霖任"凤山书院"山长时，曾于《重修凤山书院记》中说："淫讼之秽区，烟赌之迷楼，皆以书院为逋逃薮。士习如此，师资如此，殆庄生所谓以诗礼发冢（注）。明张江陵当国，尽毁天下书院，盖亦有激而然"。戊戌变法时，维新派还指出：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它的害处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主张"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这说明，当时的维新派也看出了科举制度的各种弊端，并提出了一些改良的主张，但他们不明白，若不彻底推翻封建制度，要改革教育也是不可能的。

（注）："以诗礼发冢"，语见《庄子·外物》。意思是说用诗礼所说的内容去发掘坟墓，去盗取财物，去干坏事。

以身殉学的李德彰

吴高文

前简阳县立初级中学（今简阳中学）教务主任李德彰因男女中分合问题没有达到他的主张，在愤怒之际竟自杀以身殉学。这一事件是我县教育史上空前未有的一桩大奇闻，也是解放前我县教育战线上新旧力量斗争过程中演出的一幕大悲剧。悲剧发生时，我正在前四川大学读书，没有亲眼看到；但因过去我和李德彰是前成都联合县立中学（即石室中学）的先后期同学，又系同乡关系，因此，当我得知这一噩耗，感到无比震惊和惋惜。当时对他的死，只知道一些概况。一九三八年下期我到简阳县立初级中学教书后，又曾问过去同李德彰共过事的李国瑜、李仲和两位老师（两人现已逝世）询问德彰自杀的真实原因。现将他们介绍的情况记叙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李德彰简阳县平泉区飞龙乡（今飞龙公社）人，其父李熙伯曾在简城北街经营龙门旅馆（今县财政局所在地）。本世纪二十年代，德彰高中毕业后，考入前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园艺系肄业。他一贯勤奋好学，成绩优异，颇为全系教授所赞赏（这一事实是我听到李国瑜谈的）。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大学毕业后许多人都找不到正常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路。“毕业即失业”成了许多大学毕业生的共同遭遇。那时只有教育界能容纳较多的人。所以一般大学毕业生不管你是学什么的，都拼命往教育界挤。当李德彰在中大毕业后，因找不到相应的职业，也迫不得已地踏进了教师的行列。他于一九三六年应筒阳县立初级中学校长李炯支之聘，到筒阳初中教书并兼教务主任职务。不久，李炯支因与县里教育界元老派（即顽固派）的意见不合，愤然离职他去，校长职务便由教务主任李德彰兼代。那时筒阳已开办女子初中，因班次、人数都少，单独不便聘请教师，故与男中合为一校，以便统一管理统一教学。名义上虽是一个学校，但实际上男生部在河对门今师范校地址，女生部在今城关一小地址，班级教学完全是分开的，只每周星期一举行总理（孙中山）纪念周仪式时，男女学生在同一个礼堂内参加。当时我县风气闭塞，一些封建意识浓厚的人，认为男女学生每周经常接触，就会酿成“有伤风化”的事。为了“杜渐防微”，以县教育科科长吴雪琴为首的元老派便积极主张把男女中分成两个学校。李德彰知道这一消息后，就直接会晤吴雪琴，说明两校只能合不能分的充分理由。这时的吴雪琴，对于李德彰义正词严的质问提不出任何立得住脚的理由来反驳，只得承认男女中暂时不分，并要李继续筹备下期开校的事。德彰得到吴的首肯后，也就放心去聘老师，并约他过去在中大的一些同学来筒阳教书，且寄去了路费。哪知事与愿违，当他正积极筹备开学事宜时，吴雪琴却暗中向省教育厅写了报告，要求把男女中

分成两个学校。一九三七年上期学校刚开始上课，约聘的部分省外教师还未到齐时，省教育厅的批示突然到校，同意立即把男女中分开。这一着，把李德彰弄得骑虎难下，进退维谷，新聘的外地教师怎样安置？寄去的路费怎样报销？……这些都是他难于解决的问题。他当时内心的痛苦和愤怒，我们是能想象得到的。他感到社会是这样黑暗，人心是这样狡诈，前途茫茫，怀抱无从施展，绝望之余，便下决心自杀，以死来表达他对顶固势力的抗议。一九三七年三月某日深夜，他竟自缢在男中校他的寝室内。他死后，在办公桌上发现他用钢笔写的绝命书一纸，其词谓"精神不安定，计划主张不能贯彻，痛苦万分不如死！"后来，学校除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外，还在校门外左侧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碑和碑亭。碑的正面，由教师万寿彭写的"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李德彰先生殉学纪念碑"二十个字刊在上面，碑的后面，也由万寿彭摹仿李的字体把他的绝命书刊上。此碑一直立在校门前很久时间。解放后，因简阳中学迁入城内，校舍改作军医野战医院，碑和碑亭才被拆除。

这里要顺便提及的，最近听说李德彰之死还夹有"失恋"问题在内。这一情况我从未听说过，不敢轻易肯定或否定，只作存疑罢了。

简阳蔗糖生产的起源及发展概况

谢仿琴遗稿　曾明经整理

一、简阳蔗糖的起源

要知道简阳蔗糖的起源，不得不追溯一下川糖的历史。据考查，四川之有蔗糖，大致是一七〇〇康熙时代才开始的。那时，满清政府由福（建）广（东）移民来四川定居。福、广等省是我国著名的产糖地区，移民中有不少人熟谙种蔗、制糖的技术，定居后就开始种蔗。先是在资（中）内（江）一带，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才逐渐推广到简阳，因此简阳产蔗糖比资、内约迟一百五十年。据简城河对门射洪坝谭家老糖坊七十岁（指一九五一年时）老人谭庚三说，简阳种蔗和修糖坊，闻听祖父辈说是从清道光年间在河坝地区开始的。另从简阳几家老糖坊的修建时间来看，是从清咸丰初年有的，这和谭庚三说的时间相距不远。据查那时有五家糖坊：

周家老糖坊，在上同心乡周家坝；

魏家老糖坊，在简城南门外河坝；

谭家老糖坊，在射洪坝；

张家老糖坊，在石钟滩河坝；

贺家老糖坊，在石钟滩河对门。

这五家糖坊都是咸丰至同治年间（1851—1862）修建的，至解放初尚存，人们都称为“老糖坊”。从这些糖坊的地址可以看出，当时种蔗只限于沿沱江两岸的周家坝、韩家坝、荆州坝、放生池、十里坝、射洪坝、石钟滩等河坝地区。按当时的糖坊家数、生产设备和土亩产量估计，蔗糖年产量约老秤五十万斤（注：当时估计此数有偏高），均生产红糖。

直到一九〇〇年，糖坊逐渐增加到二百家，按每家糖坊平均年产量七万五千斤计（注：当时的土糖坊，生产设备很差，使用牛力拉转石碾榨取蔗汁，大铁锅数口熬糖，每家糖坊日产量仅有七、八百斤，全年生产日约一百天左右，能产糖七至八万斤。）全县每年约产红糖一千五百万斤，除供应本县城乡人民需要外，其余则分别运销成都和邻近县，以及涪江流域、遂宁等地。

那时的蔗糖尚无专税，由简州正堂经征局除照田赋计征外，对糖蔗土亩还要收规费，在制成红糖运销时抽厘金（抽“厘金”，是丁宝桢任四川总督的一八七〇年间才有的，是当时按数量抽取千分之一的专名词）。当时的红糖每一百斤（老秤）值大米三至四老斗（一老斗，合老秤三十六斤），照大米价合成当时的制钱约一千二百文至一千六百文，收厘金十二文至十六文。至推翻满清政府的第二年（一九一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民国政府重新规定，各产糖的县设立糖税局，直属于省政府财政厅，糖税征收改为百分之二。一九二〇年以后，糖税增加为百分之十。

二、开创白糖生产

简阳生产白糖是从一九一〇年才开始有的。当时有资中人高正泰鄢澄波先后来简阳开设漏棚（制白糖的手工作坊）生产白糖。他们把资中的熬糖匠请到简阳，普查各糖坊的蔗汁砂粒粗细情况（当时制白糖要选粗砂，不用细砂。河坝地产的蔗汁，细砂的多，粗砂很少），然后选择两家能产粗砂糖的糖坊，改生产红糖为生产糖清，用比红糖略高的价格收购，作生产白糖的原料，从此简阳才生产有白糖。

据查，高正泰初开设漏棚的地址在射洪坝的王家糖坊，后搬迁在石桥镇大码头傅家大房子，至一九二一年歇业。鄢澄波初在简阳西街原义方当铺内开设漏棚，后迁至石钟滩下面河边的杨家大房子，至一九二三年歇业。在此期间，简阳的蔗糖生产有了新的发展，种蔗地区逐渐从河坝推广到山沟地带，到一九二〇年，糖坊也由原来的二百家增加到三百家。在高、鄢两家漏棚歇业后，又有富顺人刘树言到简阳开设漏棚。

刘树言是富顺怀德镇人，一九一〇年来石桥镇半边街锅碗铺当学徒，颇知简阳的经济情况。一九二一年高正泰漏棚歇业后，刘即到沪县、富顺约集股东来简阳开设漏棚。他的经营方法是：每年分期向预

约出售糖清的蔗农发放贷款，即春初一次，作播种甘蔗的费用；夏初一次作蔗土上大行肥料的费用；冬初一次作砍甘蔗和熬糖的费用。蔗农交售糖清时，按新市前后三个场期的中色红糖价格平均作价，到农历腊月扫清尾数。这种办法在当时颇受蔗农的欢迎，原因是，蔗农从春初就能得到一部份贷款，减轻了筹办蔗种和肥料资金不足的困难，兼之熬糖清比熬红糖每百斤要多熬五至六斤，故使当时的农民乐于多种甘蔗，促进了蔗糖生产的发展。

随着白糖的生产，单靠河坝地区种蔗已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因而不得不向山沟地带扩展。一九二一年，有三星乡的李春华和周大朋两家地主首先作试验性种蔗，并开设糖坊、漏棚，制出的白糖质量很好。这是由简阳人自办漏棚的开始，以后其他各乡也逐渐推广起来。到一九三〇年，三星、青龙、禾丰等地新开设的乡沟糖坊就有一百余家。

一九三〇年以后全县涌现出一批生产设备简陋、产量不多的“提笼漏棚”。原因是，当时除三星场等山沟地区有少数漏棚外，广大的河坝地区只有刘树言独家经营。刘在冬季收购糖清时，均按新糖上市时的价格收购，表面上看来是公平的，但到开春以后，糖价就上涨，每年均是如此，其结果是刘树言赚了大钱，蔗农却吃了亏。后来蔗农逐渐醒悟，其中一部分蔗农就把种的甘蔗熬成糖清后，挑回家里自漏，

不再卖给刘树言的漏棚，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到一九四〇年，全县的“提篾漏棚”就发展到一千多户，而刘的漏棚收购的糖清逐年减少，已不能保证白糖的正常生产了。

到一九四五年，全县的蔗糖生产发展到顶峰，产糖区域遍及三十二个乡镇，开设的糖坊达七百五十家。此后，糖坊就再没有增加了，全县的蔗糖产量还有所下降。原因是，那时简阳的烤烟正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许多农民感到种烤烟比种甘蔗更有利，便将原来种甘蔗的土地改种烤烟，甘蔗面积逐渐减少，致使每年都有一部份糖坊因缺乏原料而停止生产。

附表一：简阳蔗糖生产发展情况

年度	糖房户数	产品分类户数		年总产量（老称）
		红糖	白糖	
1850年	5	5		50万斤
1900年	200	200		1,500万斤
1920年	300	200	100	2,250万斤
1930年	400	120	280	3,000万斤
1940年	600	180	420	4,500万斤
1945年	750	200	550	5,625万斤

附表二：历年糖价与米价的比例

年度	蔗糖价格(一千斤)	大米价格(一老石，合老秤360斤)	蔗糖一千斤换米若干石
1910年	24两(生银)	5．5两(生银)	4.36石
1920年	45元(银元)	12元(银元)	3.75石
1930年	130元(银元)	17元(银元)	7.65石
1940年	750元(法币)	280元(法币)	2.7石
1945年	9万元(法币)	2.2万元(法币)	4.1石

编后语：这篇史料，是曾明经根据谢仿琴在一九五一年七月写的《简阳产糖历史的调查》整理的。谢在一九三九年石桥镇商会成立时即任文书职务，直到解放。一九五〇年筹建简阳工商业联合会时，谢继续留任石桥分会文书，至一九五八年退职，一九六四年前后去世。谢仿琴写这篇《调查》时，曾明经曾协助他查阅“简阳区制糖工业同业公会”所存的有关资料。现在整理这篇史料时，曾明经根据自己的回忆所及，作了少量的补充。——编者

石桥的义源商号

邱瑞良

石桥的“义源”商号，是周体仁独资经营的，它是一个代客买卖的行栈，其业务范围宽，购销数量大，学徒、店员和勤杂人员一大帮，在四十年代中堪称为简阳最大的商号。

周在幼年时代，家境不甚丰裕，仅读私塾数年。青年时在出任三台县庭长的吴国祯的衙门里充当录事。后在成都段治平开设的银号当助理会计。数年后回到石桥，经舅父陈子奎担保，借得姨母一千元大洋，在石桥镇开设干菜铺，由周弟兄三人共同经营。在政治上，由于陈子奎的提携，周先后得任石桥镇市政所长、简阳县收支所长等职。

“义源”的前身是“万丰堆栈”。一九四一年，周体仁联合其弟周次孟经营的“禾丰”和张紫辉经营的“全泰长”两个干菜铺合资组成“万丰堆栈”，周体仁任总经理。是时正当抗战，物价不断上涨，只经营了一年，即赚了不少钱。周见有利可图，有意独占“万丰”，因而借故将“万丰”解散，改为周体仁独资经营，并将牌号改名为“义源”。

周体仁独资经营“义源”时，资本甚微，估计约有白糖十吨。因

“万丰”解散时尚未交纳所得税，他便以总经理的名义，以交纳所得税为借口，巧妙地提留了一大笔资金，声称“待交税后再按股金退补”。他即将这笔资金在中和桥柴市坝租佃了一幢旧平房，略加修整，挂出“义源”的招牌开业了。

一、整顿企业

周体仁解散“万丰”后，连同人员一锅端过来。由于“万丰”是合资经营，股东们不太关心企业的利益，因此，管理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人浮于事和浪费现象。我是一九四一年八月到“万丰”当学徒的。那时，全店的人员除股东外，有严厚成管总账，周其之管流水账兼出纳，徐善普管书信往来，吕文藻管上市采购白糖。还有炊事员二人，勤杂人员二人。学徒中有黄万宁跑街专门收款，李集成、华光伟和周书洪负责查验大样、改包装、办税、发运等。周渐逵和我才上店不久，只分配在来客时拿烟倒茶和烫洗铜水烟袋，后又来一个周的亲戚谢贻汉，更无事可做。因为人多事少，老板多在外应酬，很少来店，学徒们都是十多岁的人，大多贪玩，也无人过问。由于家大业大，费用开支大手大足，财产遭受损失，也从未有人认真追究。例如有一次我和周渐逵抬油，因年小体弱，把菜油倒了好几百斤；再一次检查仓库不细致，造成油篓漏油从阴沟流跑几百斤。发生这些事故，我们当然不敢说，守仓库的邱炎午虽向老板反映过，因是股东生意，对某一个人

的利益影响不大，故无人出面过问。

企业改为周体仁独资经营后，他针对原企业中存在的问题，对企业进行了整顿，大量裁减冗员，在原有的十多个人员中，只留下黄万宁、周书洪、周渐逵和我，勤杂留魏明禄一人，炊事留谢国斌一人，其余的人全部裁掉。业务分工由黄万宁跑街兼出纳，周渐逵管账，周书洪负责验大样、改包装等，我则接待顾客、协助买糖、跑银行、办税、发运和信电往来工作。只我们四个年青的徒弟就把全部业务承担了。我们每个人的工作负担都很重，特别是逢场天，从早晨开始一直要忙到深夜十二时以后，老板还不给加一顿夜餐。以后老板见我们的工作太忙，怕影响他的业务，才又请了一个临时计件的先生专门上市买糖。那时，我们尽管十分劳累，但还认为我们几个徒弟被留下来是老板对我们的信任，因而感到庆幸，都愿意勤勤恳恳地搞好本职工作。后来才明白，只留我们几个并非老板的偏爱，而主要是从他的利益出发的，其原因有三：第一，我们几个都是他的徒弟，年纪又轻，若不听话可以随意打骂，甚至开除；第二，都是廉价劳动力，老板除管吃饭，给几个零用钱外没有工资，只有年终赚了钱分点红利；第三，我们都有一定的文化（黄、周和我都是初中生，那时一般都瞧不起学徒这样“下贱”的工作，在学徒中的初中生为数甚少），而且又肯干，在业务上顶得起来。这说明周体仁在用人方面是精打细算的，加上他对企业的精心管理，浪费现象也随之消除了。

二、投机倒把、牟取暴利

在旧中国，流行有一句行话叫做“拖筏子”，这是指银行界里以“母号”带“子号”（又称“内号”）的意思。所谓“带”主要是借银行的招牌吸收货币，给子号提供大量的资金，以便投机倒把，牟取暴利。“义源”虽不是银行，但也属于这种类型，而且比银行更为有利。因为银行只掌握货币，而“义源”除掌握有足够的资金外，还掌握有大量的实物。“义源”有两个子号，只有几个小股东，名为合夥生意，实际等于周独资经营，一个是在“万丰”时就有的“永吉商号”，一个是新增设的“永丰昌冰棚”。“义源”虽只是代客买卖，不兼其他业务，但资金却很丰裕，这些资金不是周体仁投入的，而是来源于外地的运销商。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南方的交通断绝，晋、陕、甘、豫等省的商人，以陕西省的最多，统称“老陕”，他们需要白、桔糖以满足当地的需要，大都到石桥采购。办法一般是先汇款来，委托“义源”代购；急需购入时，也常有亲送现款来的；还有的是由我店卖出“省票”，他们在成都付款。“省票”，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汇款方式，办法是，由我店用条形白纸书写“凭票付款□□□元整”，并在金额上盖好号章，然后对裁或剪成弯曲形的两半张，以半张寄给付款人，另半张交给收款方寄往成都取款。买“省票”的主要是石桥经营米、油、油桔的商人，他们需在成都、新都、三合场等地进货，这样把现款就地付给“义源”，即可在成都取款，既减少了汇费，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